

中国

三代作家

纪实

涂光群 著

★作家写真集

★文坛秘闻录

★佳作出世记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三代作家纪实/涂光群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5.

ISBN 7—5059—2242—4

I. 中… I. 涂…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5557 号

中国三代作家纪实

涂光群 著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平山中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375 印张 4 插页 377 千字

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300 册

*

ISBN 7—5059—2242—4

I·1613

定价:18.80 元

目 录

	序——王 蒙	• 1 •
	我与《人民文学》	• 3 •
第一辑	作家写真集	• 27 •
	巴 金的文稿	• 28 •
	冰 心的心	• 31 •
	回忆邵荃麟	• 34 •
	沈从文印象	• 44 •
	张天翼和《人民文学》	• 50 •
	沙 汀和艾 芜	• 58 •
	小 川与李 季	• 61 •
	不屈的文人	• 65 •
	——李 季在“文革”后期	
	肖 殷在当年	• 70 •
	柳 青和孙 犁	• 80 •
	林默涵的眼镜	• 88 •
	周立波二题	• 89 •
	——抗辩·简易楼	
	自沐朝晖意蓊茏	• 92 •
	——诗人臧克家剪影	
	为严文井画像	• 103 •
	火·清泉·风之舞	• 107 •
	——刘白羽、杨 朔、徐 迟	
	书生冯 牧	• 115 •
	吴伯箫投稿	• 122 •
	文坛伯乐秦兆阳	• 124 •
	岭南三作家	• 135 •
	——欧阳山、杜 埃、秦 牧	
	韦君宜和黄秋耘	• 147 •

目 录

皱眉的和微笑的	• 156 •
—— 杜鹏程和王汶石	
雪里红梅	• 161 •
—— 怀王 莹	
舒 群的寓言小说	• 168 •
从红土地走出来的作家	• 173 •
—— 记马 宁	
涵 养	• 180 •
—— 俞 林纪实	
风雨生涯三十载	• 189 •
—— 柳 溪往事	
肖 平这个作家	• 195 •
从《明镜台》到《反腐败纪实》	• 201 •
—— 小记作家耿龙祥	
人生的戏剧	• 205 •
—— 浩 然逸闻	
诗人李学鳌	• 211 •
三个坚强的女性	• 217 •
—— 胡 风夫人梅 志	
路 翎夫人余明英	
李克异夫人姚 锦	
一个文学编辑的故事	• 229 •
—— 王朝垠传奇	
很特别的女人	• 244 •
—— 香港女作家夏 捷	
寻访水 静	• 249 •
壮族长篇作家农 穆	• 257 •
青海采风	• 262 •
—— 写青海民族作家群	

目 录

第二辑

文坛秘闻录	• 270 •
毛泽东词六首发表内幕	• 271 •
沈从文写《跑龙套》	• 273 •
老舍“赶任务”	• 275 •
赵树理后期的困惑	• 279 •
欧阳山和他的《乡下奇人》	• 284 •
陈翔鹤为什么写《陶渊明写〈挽歌〉》	• 286 •
肖也牧和他受批评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	• 289 •
最早的弗罗依德主义者？	• 292 •
——方纪和他受批评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些》	
无所适从	• 294 •
——一篇受批评的小说，朱定的《关连长》	
从维熙《远去的白帆》从退稿到获奖	• 296 •
谷峪——一个被湮没的作家	• 299 •
中国“作协”反胡风运动一瞥	• 304 •
严望——一个角色	• 311 •
丁、陈一案小窥	• 319 •
陈企霞其人	• 329 •
中国“作协”反右扫描	• 336 •
求索的苦果	• 352 •
——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出世前后	
中国“作协”“文革”亲历记（上、下）	• 361 •

目 录

第三辑

佳作出世记	• 422 •
刘心武的《班主任》	• 423 •
莫 伸的获奖作	• 427 •
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	• 430 •
宗 璞的《弦上的梦》	• 435 •
张 弦的《记忆》	• 438 •
唱赞歌的张承志	• 441 •
陆文夫和他的《献身》	• 444 •
刘富道和他风趣的《眼镜》	• 447 •
张有德获奖作《辣椒》	• 450 •
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	• 453 •
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	• 457 •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	• 460 •
李国文和他的《月食》	• 462 •
何士光的《乡场上》	• 469 •
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	• 472 •
张抗抗的《夏》	• 476 •
韩少功和《西望茅草地》	• 479 •
《三千万》——作家柯云路的起点	• 483 •
《内当家》和王润滋	• 486 •
路 翎的《初雪》、《洼地上的“战役”》	• 489 •
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	• 499 •
王 蒙写组织部的年轻人	• 503 •
汪曾祺和《羊舍一夕》	• 506 •
美术家蔡若虹的小说	• 510 •
石 果的《风波》	• 514 •
——一篇被忽略的佳作	

序

王 蒙

我早就对一些文学机构说过，如果把他们的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的历程写下来，会很有意义，很有故事，很有——刺激。

正视历史与写出真实并不容易，因为总是有人怕真话，怕现在的真实也怕过去的真实——历史。

但最好是面对，哪怕是不那么愉快的真实。面对了才能超越，才能长进，才能不重蹈复辙。这里，是非短长是不值得争议的，怎样才能在今后做得更好？这才是需要掩卷深思的。

1994年9月1日

序

敬

我早就对一些文学刊物说过，如果把他们
的几十年来如风风雨雨的历史写下来，会很有
意义，很有价值，很有——刊版。

不过历史与写出真实并不容易，因为总是
有人怕真实，怕现在的真实也怕过去的真实——
历史。

但最好还是面对，哪怕是不那么愉快的真
实。面对了才能超越，才能公正，才能不再被
复辙。这是，是难能可贵不得多论的，怎样
才能在风中保持更好，这是需要提笔深思的。

1994年9月1日

我与《人民文学》

我觉得写自己最困难，因为当事者迷。但这题目是一位朋友出的。想想还有的可写。然究竟能写出些什么，只有天知道了。

我是1953年1月5日到《人民文学》报到的，时年20岁。离开时是1982年3月，49岁。倏忽之间，三十个年头过去了（应该说明的是这期间仅有三年不在《人民文学》，那是1973年起，被从“五·七”干校分配到《体育报》工作）。三十年是一个甲子的一半，超过了四分之一的世纪。我有时觉得时间过得飞快，三十年间发生的事情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有时又觉得时间过得真慢，我简直要失去耐心。对我来说，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全部献给了《人民文学》，那是挥汗如雨、没明没夜地工作；那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扩充知识。一生中璀璨的壮年，也全部献给了《人民文学》，那是殚精竭虑地为文学的拨乱反正效劳，为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使劲，为一批文学新人的面世创造机会……

记得吗？我是从最普通平凡的工作做起的。1953年刚到《人民文学》，我在评论组处理读者来信。读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简单的文学常识到深奥的文学理论问题。其中有个读者写了一份长篇小说的提纲，问“这样的题材能不能写”。此人就是上海芦湾区委的姚文元。我不腻烦这些读者的提问，而

是设法答复他们。有时答复不了，我就去借阅有关参考书，现“贩”现“卖”地回答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就不断增加新知识。1953年下半年，我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文章《漫谈青年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问题》，即是综合读者来信的提问而写出的。这段时间给我印象深的是何其芳认真、严细的作风。他是编委，负责审读评论稿件。评论组常常读他的审读意见或写给某个作者的信，密密麻麻的小字工工整整、条理分明地写满了几页纸。还有茅盾、叶圣陶、老舍、张天翼等作家的手稿和信件也是写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这些名家的手稿和信件评论组一直保存着，在“文革”中却不知去向，被造反的邪火毁灭了。1953年下半年我离开评论组被调去做版式、美术编辑兼做一点编辑部的秘书杂务。《人民文学》月刊的发稿、划版式、跑印刷厂，同出版部门和印厂打交道，每期18万字的三校通读，由我一个人包揽。除此以外，跑华君武（时任《人民文学》美术顾问）那儿，跑美院、美协找画家设计封面、约画稿（那时《人民文学》每期至少有两张单幅画的插页），也是我的事儿。我常常在夜间去找画家，雅宝胡同的画家宿舍、中央美院，是我去得勤的地方。我因而有幸不时观摩各种各样的画，有幸见到当代中国最活跃的一批画家：张光宇、张仃、蔡若虹、董希文、李桦、艾中信、蒋兆和、彦涵、古元、黄永玉、王琦、王逊（理论家）、李宗津、李平凡等等人。我不光联系北京的画家，还联系全国各地的画家。比如浙江美术学院版画家洪世清、赵宗藻两位，我代表编辑部常同他们联系，并数次发表他们的版画新作。黑龙江最出名的版画家晁楣也是。那时编辑同作家的联系从不署名，估计这些画家至今不知道《人民文学》同他们联系的编辑姓甚名谁。为了增加一点美术常识，我通读了当时能找见的中外绘画史、美术史，得益不少。尽管工作杂乱，我仍

有余闲时间，曾经一再向领导请求加一点工作量，领导遂要我兼读地方文艺报刊，从中选拔可供转载的佳作。1955年下半年我调到小说散文组，不再做版式编辑仍兼美术编辑。在《人民文学》的最初两三年，我学会了干一行学一行，不拒绝细小工作这样一种精神；学会了耐心地处理群众来稿。1955年《人民文学》首次举办工业建设征文，我从中选发了不少无名作者的佳作。和谷岩第一篇受到好评的写抗美援朝的散文《枫》，是我从来稿中发现的。当时我推荐转载的地方报刊作品有李準的《不能走那条路》、郑秉谦的《柳金刀和他的妻子》等等。往往在《人发文学》上选载一篇小说，就等于推出一个新作家。

1955年12月秦兆阳调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后，作协领导期望《人民文学》办得更活跃，增强“现实性、群众性、战斗性”。也就是这时候，领导让我做《人民文学》的代理小说散文组长，直至1957年5月的反右前夕。秦兆阳任职的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是《人民文学》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期间首次认真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刊物确实加强了现实性、群众性，佳作迭出，新人不断涌现。一批建国以来最活跃的新作家如王蒙、张弦、宗璞、肖平、林斤澜、任大霖、刘克等等，正是这一两年崭露头角，而刊物也以显著地位发表他们的作品。刊物的发行份数翻了一番，从十来万份，跃至二十余万份。我在这段时间的体会是只要认真执行双百方针，广泛团结作家，创作的气氛宽松、活跃，就会出人才，出好作品。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向刚回国不久的电影演员王莹组稿，她曾将手稿《两种美国人》整理出一段交给我们。有位老干部、驻外大使王森也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电影剧本。此外还有画家张仃的夫人布文，作为一个读者被《人民文学》这本刊物所吸引，也写短篇小说向《人民文学》投稿，均被采用，并获好评。

这样的事例很多。但随着1957年下半年反右扩大化，一批活跃的年轻作家被划“右”，许多作者保持沉默。王莹写美国生活的小说只好由我去退稿。《人民文学》的小说版面，由稿挤转为缺稿。

1957年下半年我调《人民文学》评论组工作，直至1960年底。1959年起任《人民文学》评论组长。那时主编张天翼抓评论组的工作，评论组几个人常去他家开会。天翼主张《人民文学》不要搞纯理论而要多发创作谈和作家谈创作的文章。这样较易为青年作者接受。天翼反复强调作家的功力在于从平凡生活中去发掘、表现不平凡，这正是现实主义理论的精髓，这一点给我印象很深。于是我们下工夫组织发表了梁斌谈《红旗谱》，杨沫谈《青春之歌》，吴强谈《红日》的长文。所谓下工夫是指组稿前深入研究了作家和作品（评论组曾就这几部作品的艺术特色和作家的创作个性进行了多次讨论），在此基础上，才去向作家提出组稿的具体要求并和作家交换意见。作家的思路打开了，思考缜密细致，写成的文章便是自身生活经验、创作经验恰当的总结，并能提出一系列创见。如梁斌谈《红旗谱》的文章便对长篇小说如何民族化群众化等问题讲了很深刻的体会和看法。这些文章发出后遂受到评论界、作家和读者较广泛的欢迎，也曾被有的创作部门编印成小册子发送。此外还分期发表一批名家如荃麟、默涵、唐弢等的创作谈短文。我们整理当前创作问题的材料，提供给作家、评论家参考，又邀请他们去公园开“神仙会”，由主编主持，喝茶、神聊，会后就产生了这些短文。当时我还做了个尝试，就是约请关心和爱好文艺的老干部包括将军、省长等写文学评论文章，为此走访了两位儒将张爱萍（时任副总参谋长）和周桓（时任沈阳军区政委）。结果张将军谈革命回忆录写作的文章由我们整理发表。我

数次去山西太原，请作家赵树理的老友、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谈赵树理的小说，历时数月，整理成《谈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一文在《人民文学》发表。该文发出后，因其独到见解，受到文学界重视，全国作协立即发展王中青为会员。

1961年初，领导任我为《人民文学》小说组长（兼复审诗稿），直至“文革”发动的1966年5月。60年代开始，时值三年暂时困难期间，中央的总方针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文艺界再次重申贯彻双百方针，广泛团结作家，《人民文学》遂迎来第二个“放”的时期。在这样的气氛下，虽说物质生活比较艰难，作家的心情却转向宽松、舒畅，而这是出好作品的前提条件，短篇小说生机复苏肯定有望。《人民文学》执行主编陈白尘积极推进双百方针的实现，我们小说组八个人也协同动作，同他配合默契。于是60年代初期《人民文学》的版面上，一方面是老作家创作的活跃，沙汀、艾芜、魏金枝、舒群、周立波、欧阳山、徐迟、骆宾基、谷斯范等都有新作发表。其中不乏佳作，如艾芜的《野牛寨》，欧阳山的《在软席卧车里》、《金牛和笑女》，徐迟的《祁连山下》，周立波的《张满贞》，舒群的《在厂史以外》，骆宾基的《山区收购站》，魏金枝的《礼物》，谷斯范的《新战士小蓝》。就连多年不写小说的陈翔鹤、冯至也拿起笔来写出《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和《白发生黑丝》，重开历史短篇的新河。美术家蔡若虹试笔以雷萌笔名发表短篇《路遇》，也获好评。另方面中年作家、青年作家也很活跃，一时佳作纷呈，如王汶石的《严重的时刻》，汪曾祺（曾被错划右，此时提起笔）的《羊舍一夕》，陆文夫的《葛师傅》、《二遇周泰》，谢璞的《二月兰》，方之的《岁交春》，林斤澜的《新生》，刘真的《长长的流水》，张天民的《路考》，肖平的《圣水宫》，宋词的《落霞一青年》等等。1962年下半年李

季被任命为《人民文学》执行副主编，接替请创作假的陈白尘。不久十中全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这一精神传达下来，《人民文学》小说组首当其冲。我们曾受命选发女作家李建彤写陕北革命领导人刘志丹的长篇小说新作，选好的一段已经发稿，立即被抽下来。因小说已被定性为“反党小说”。编辑、作家原有的宽松心情再也没有了，而是变得战战兢兢。接着在1963年下半年和1964年上半年毛主席发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文学界发动批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论，短篇小说创作的路子遂越来越窄了，几乎走向绝路。李季紧跟形势发动“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的征文，小说组为此做了努力，然而除了萧育轩的《迎冰曲》、王家斌的《聚鲸洋》、王以平的《志气》，好像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作品。但他提出的举办“故事会”、组织反映一个地区剪影的速写，如“延安速写”、“青海速写”、“西昌速写”、“大庆速写”等，尚能对活泼版面起着一定作用。此外，主编张天翼提出的为青年作者举办读书会的办法，也收获了一些作品。

1966年出了第5期后，《人民文学》被迫自动停刊，直到第十个年头的1976年，才复刊。我于1976年2月回到《人民文学》任小说散文副组长，我原来的副手任组长，我们两人换了个个儿，但仍相处很好，合作愉快。这时的主编是袁水拍，常务副主编是从上海调来的施燕平。我们为“四人帮”一伙人提出的文艺要写“跟走资派作斗争”忙活了大半年，直到10月初粉碎“四人帮”，才算松了口气。这时主编倒台，副主编靠边，由张光年暂时代理主编，刘剑青负责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但不久我的同事、组长被安排临时离开工作岗位，自1977年末直至1978年上半年，小说散文组的工作便由我一人负责。我拼全力地执行邓小平“完整、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文教战线

上拨乱反正”、“尊重知识分子”等讲话的精神，率先在《人民文学》的版面上组织了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体裁的“拨乱反正”的作品。小说如1977年至1978年轰动一时的《班主任》、《窗口》、《神圣的使命》等佳作，报告文学如《地质之光》（写科学家李四光的）、《哥德巴赫猜想》（写中年科学家陈景润的）；散文，则是大量的回忆老一代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等人的作品。这个时候，文联、作协的组织尚未恢复，编辑部的领导也不能说是很完善。编刊物很大程度是靠了工作人员的自主精神和首创精神。我和我的几位老同事周明、崔道怡、王朝垠等仍是合作良好，重大的选题一起讨论、商量，商定了便各自发挥主动性去促其实现。如周明在散文、报告文学方面，崔、王在小说方面。此外，几位较年轻的新调来的编辑也很努力。我一向认为要做好编辑工作不在人多，而在于人精干、又团结协作，这就造成强势。再则刘剑青作为编辑部领导虽说弱一点，但他作风较民主，有事好商量，也为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我还记得那时我们发出一篇又一篇为“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工程师）和领导干部（“四人帮”所谓的“走资派”）说话的小说，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得到广大读者热烈拥护，读者来信雪片般飞向编辑部。另一方面，在有些人眼中这简直是犯了“天条”。那位靠边的副主编曾对人说：现在发的小说，要在前些日子（指“四人帮”掌权时期），可以说，篇篇都犯了杀头罪！平心而论，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人民文学》作为“潮头”刊物发的小说、报告文学等，的确对国家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起了配合的作用。从文学意义来说，这些小说不仅仅恢复了文学自“五四”以来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而且进一步突破了“文革”前“左”的指导思想为文学创作规定的种种禁区，例如写“大墙内”（监

狱)的生活;接触生活的阴暗面、落后面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回想起来,那些对社会生活的前进、对文学创作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短篇佳作的出世,从1977年——1978年的《班主任》、《神圣的使命》、《眼镜》(刘富道作,以“文革”为背景,以幽默风趣笔法,写生产岗位上正直知识分子反抗“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倒行逆施)、《弦上的梦》(宗璞作,以1976年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第一篇小说)等作,到1979年的《记忆》(张弦作,第一篇写“文革”后,领导干部对过去所犯“左”的错误反思)、《月兰》(韩少功作,第一篇写“文革”中“四人帮”极“左”路线对农民群众的损害)、《我爱每一片绿叶》(刘心武作,第一个提出“文革”中对人的个性的毁灭和尊重人的人格、个性这一严肃的问题),1980年的《夏》(张抗抗作,提出了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清除极“左”思潮影响,发展健康个性)、《西望茅草地》(韩少功作,剖析了在一个老革命身上正确的革命的东西和以“左”的面貌出现的保守、狭隘的小农意识以至封建残余意识相混杂的复杂矛盾心态),它们的出世,决非一帆风顺的。这是因为在社会的急速变革之中,一些人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暂时还未能跟上、适应新的形势。文艺界,像我们这些普通编辑是如此,而我们的上司,主编、副主编等也难例外。这些对稿件有终审权、拍板权的人,他们富有经验,自然也比我们初审、二审的人更慎重,考虑问题更周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能保证,他们对每一篇作品的鉴定,都是正确的,不会发生失误。作为充当承上启下的二审角色的我,既非常尊重他们,也尊重第一个负责稿件初审的编辑同仁。而在对稿件的评价发生分歧、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这常常是难免的,在社会急骤变化的时期尤其如此),该如何对待处理呢?因为一篇稿件如何处置一发表还是退还作者修改,还是根本否定,

退稿——关系作者，也关系作品的命运。我的做法是，对上司是据理力争，方式委婉，接受必要的妥协，以争取作品出世（如果我认为我对稿件的评估是正确的，而它确实又是一篇佳作的话）；对下，仍是方式委婉，采取平等讨论，商量说服的办法。他们对稿件的评估错了，我指出来，我该坚持的还得坚持；如果是我错了，我也公开检讨、改正，不掩盖自己的失误。总之，不断为佳作的出世，开道路，而不是将它扼杀于未面世之时，这对刊物，对作者、读者，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一个有作为的编辑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这些佳作出世，并非一帆风顺的过程，我不想详说，只举一些例子。《班主任》这篇稿件来到编辑部后，责任编辑觉得它对“四人帮”的揭批是深的，但问题提得太尖锐（指谢惠敏这样的好学生也中毒受害，“小流氓”宋得宝的父亲却是一位园林工人），是不是属暴露文学，能不能发出，没有把握。我也写了很长的意见，认为作品写的是实事求是的，符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文教战线也要拨乱反正的总的精神，因之作品可以发表。但稿件送到编辑部负责人那里，他也说没有把握，这才送到主编张光年那儿，请他拍板定夺。光年看了稿件后有针对性地说，“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他是肯定这作品的，认为细节上小作修改后（如对园林工人形象的处理等）即可发表。这才为《班主任》的出世开了道。刘心武有幸遇见了主编拍板正确。当然责任编辑怕它是“暴露文学”的担心也可以理解，因为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将一些触及社会阴暗面的作品一概打成“暴露文学”——“反党”毒草，谁不害怕放出了“暴露文学”呢？《神圣的使命》曾被我们小说组两位有经验的编辑两次退稿，因为它触及了最尖锐的公、检、法部门（专政机关）的拨乱反正问题。而在过去，在“文革”前，一般是不允许文艺作品触及公、检、法部门（专政机关）的缺